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川渝地区及对迁驻地的影响

陈冬英*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厦门 361005)

摘要: 抗日战争期间, 沿江、沿海地区的高校为了保存中国文化的精华纷纷迁往内地。本文在简述高校内迁的背景后, 以川渝地区这个迁驻地为例, 试图探明高校内迁川渝地区的具体情况, 并分析高校迁入后对当地的教育、文化、经济、政治和卫生事业的影响, 为现今高校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提供些许借鉴。

关键词: 高校内迁; 迁驻地; 川渝地区

The Internal Migr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Anti - Japanese War and its Influence to Immigrating Places in Sichuan - Chongqing Region

CHEN Dongy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Research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361005 ,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 universities in coastal and river areas migrated to inland. Taking Sichuan and Chongqing as examples ,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the background of the migration , illustrate the details , and further analyze its impact on local education , culture , economy , politics and health service ,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universities and west regions.

Key words: internal migration of universities; immigrating place; Sichuan - Chongqing region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53 - 1203/C (2012) 2 - 0017

抗日战争爆发前, 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主要集中在北平、武汉等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但这里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 是最易为日本侵略者所覬覦的。因此, 随着日军侵华进程的加剧, 这一地区的高等教育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载体首先遭到重创。为了保存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高等教育的实力, 大批高

校纷纷被迫内迁。这一次历经八年 (1937 ~ 1945 年) 之久的史无前例的高校大转移, 不仅改变了原有的高等教育布局, 而且对带动迁驻地的人民支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 同时推动当地的科教、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 作者简介: 陈冬英 (1986 ~), 女,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一 高校内迁的背景

日本在侵华的战略中早已意识到，日本要想在中国达到长期统治奴役的目的，势必得消除中国人民的固有文化和民族反抗意识。再加上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面对民族危亡纷纷站出来宣扬抗日救国，日本将中国知识青年列入危险分子名单，所以日军所到之处都对文化教育机构进行野蛮摧残。战争期间，我国专科以上的高等教育机关首当其冲地成为日军轰炸破坏的主要目标。^[1] 日军每占领一处高校，都进行肆意破坏、劫掠财物，甚至迫害高校师生。90%以上的大专院校均程度不同地受到日军的蹂躏；截至1939年4月，日侵华战争给我国92所专科以上学校造成的损失是：死伤108人，财产损失65367409元法币。^[2]

国民政府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根本无能力保护我国东部的高等教育。在此关头，教育界关于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人主张战时教育，认为将教育与抗战相结合，缩减高校，大学生也应上前线作战；而另一部分坚持正常教育，认为高校仍应保留，按照高等教育自身规律顺其自然发展，不应把高校当训练士兵的场所。为了平息争论，国民政府最终给出“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指导方针，并先后颁布了用来指导战时高校迁移、安置等工作的文件。1937年7月所颁发的《战区内迁学校处置办法》规定各省市教育厅局“于其辖区内或境外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加以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之用”^[3]。随着战争的加剧，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9月份又颁发了《社会教育机关临时工作大纲》，指示高校“在轻微袭击时，应力持镇静，必要时可作短时停闭，激烈战事时可暂停或迁移”^[4]。另外，国民政府又于1938年成立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去具体负责全国各地高校迁建工作，决定把一些重要的国立、省立高校和研究所迁到西南、西北各地。1939年3月，在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蒋介石发表的“训词”更是表明政府的态度，认为抗日战争“一方面是争取

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的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建设我们的国家……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技工和技师，更需要几百万的教师和民众训练干部，这些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供给的，这些问题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解决的”^[5]。

简而言之，为保存我国高等教育的实力，使中国传统文化不因外敌侵略而中辍，高校内迁成为当时中国必然的选择。

二 高校内迁川渝地区的情况

从1937年全面抗战算起到1945年抗战结束，高校内迁持续了八年。全国高校内迁大致有四大方向：一部分迁往西北；一部分迁往租界、香港等地区；一部分由城市迁往省内较偏远的县镇，如厦门大学迁往长汀，湖南大学迁往辰溪；大部分学校则是迁入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内迁最为集中的地区当属川渝地区（即重庆、成都两个城市周边及其之间的地区），主要是重庆和成都两地。

川渝地区在战前总共有五所高校，即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私立华西协成大学与重庆的省立重庆大学、省立教育学院、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而在抗战期间，川渝地区陆续迁入高校如下表所示。其中，成都接收了10所内迁高校；重庆先后接收院校达30多所（大学9所，独立学院10所，专科学校12所），加上重庆大学和新创学校，该市高校最多时多达39所^[6]；另外在乐山、璧山、江津、巴县等地也有高校迁驻。川渝地区之所以成为内迁院校的主要聚集地，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随着日军侵略的加深，许多大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也被迫将首都迁往重庆，这自然带动企业、学校、人口往大后方移动。其次，川渝地区主要位处四川盆地，北部秦岭和大巴山、南部云贵高原、西部横断山和东部巫山形成天然屏障，而且远离前方战场，虽也有日军的空袭，但相对安全系数较高。另外，川渝地区在西南地区较为发达，资源丰富，山路和水路交通都较为便捷。

高校内迁川渝地区一览表

高校入迁来源	总数	高校
华北地区	6	东北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私立铭贤学校、私立朝阳学院、燕京大学
华东地区	28	山东大学、山东医学专科学校、齐鲁大学、同济大学、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私立光华大学、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私立复旦大学、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国立牙医专科学校、国立江苏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蒙藏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国立南京药学专科学校、江苏蚕丝专科学校、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中南地区	6	国立武汉大学、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私立医药技术专门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私立湘雅医学院
西南地区	5	国立四川大学、国立贵阳医学院、私立贵阳学院、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私立华侨工商学院

上表根据《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整理获得。

这些内迁到川渝地区的高校可谓五花八门：按学校创办者的不同，可分为国立、省立和包括教会学校在内的私立学校；按学校性质分，则分为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另外，高校设置的时间也是有长有短。这批高校迁往川渝地区的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39年左右，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多数高校随着前往，如国立中央大学；第二阶段，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2年，原躲避在美英在华租界和香港的私立学校迁往重庆、成都，如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第三阶段，1944年至1945年，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和日军的进逼使得原在广西、贵州的高校和前阶段迁移至此的高校再次迁移，如之前迁到贵州的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被迫再次迁往四川璧山。

在内迁过程中高校虽然受到炮火轰炸和长途跋涉的影响，但仍然能够依托川渝地区原有条件进行办学。除了少数高校迁往城市外，多数高校迁往较为偏僻的村镇。办学地多为迁驻地大、中学校的校舍和实验室以及民宅寺院。以同济大学为例，1942年迁驻四川李庄后，其“校总办公室设禹王宫，工学院在东岳庙，理学

院在南华宫，医学院前期在祖师殿，图书馆在紫云宫，大地测量组在文昌宫，体育组在曾家院子，实习工厂在官山，工学院男生宿舍在东岳庙东侧和羊街，女生宿舍在慧光寺，教师宿舍在大夫第、羊街、可颐园、肖家院等处。^[7]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借住在川渝地区原有大学的少数高校外，绝大多数内迁高校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下坚持教学。许多专家内迁川渝后还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当地重大问题，如边疆问题研究、藏学研究、资源与生物物种的调查与开发、农学研究等，并取得成就，为优势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8]

三 高校内迁对川渝地区的影响

高校内迁到迁驻地后，一方面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迁驻地民众的欢迎和帮助，坚持开展教学，培养人才；另一方面高校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并对迁驻地提供社会服务，促进了当地教育、文化、经济、政治和卫生事业的发展。

1. 促进教育的现代化。纷纷迁入川渝地区的高校与原有的、新建的高校一起克服困难，积极开展学校的建设工作，为当地高等教育事

业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契机。首先，各高校迁入川渝地区后，学生升学便利，扩大了川籍学生的入学机会。超过全国国土面积与人口 1/10 的川渝地区是西部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但仍远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在 1936 年时该地区大专学校只有学生 2885 人，占全国大专生总数的 8.3%；1945 年时在迁至该地区的院校上学的大学师生约有 3 万多人，比之前增加了近 13 倍，当中，川籍生与外省籍生的比例约各占一半。^[9]其次，内迁高校师生还在川渝地区新建了四所院校，即乡村建设学院、社会教育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些院校与原有的高校发挥了播种机的作用，培养了大量合格的师资。另外，许多内迁高校还实行宽松的旁听制度，即使是校外的青年也可以随意旁听。内迁高校也改变了迁驻地中小学基础教育落后的状况。除了前面提及的新建院校大力培养了中小学的师资力量外，还有很多毕业生和在校师生去当地中小学兼职代课。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后，便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到中小学任课，提高了当地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并设立中小学各一所，其中珞珈中学（即武汉大学附属中学）在当地以教学水平高著称。^[10]高校师生还将理论知识和实践有机结合，对当地民众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他们走出校园为当地群众举办民众夜校、识字班和科学讲座，促进了西部地区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等文化活动的开展。

2. 带动文化的大繁荣。随着高校内迁，全国科教文化界的大批杰出学者也来到了偏远闭塞地区，将先进的文化知识和思想观念传播给川渝地区的人民，带动了当地文化的繁荣。在抗战期间川渝地区大量出现了西陲文化书院、“文协”成都分会、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华西边疆研究所、四川农业改进所和各院校创办的研究部等各类学术机构和团体。随之发展的是各种学术刊物出版，如《四川教育》、《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科学》、《宇宙》等，有力地促进了川渝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当时内迁高校聚集的地方往往形成文化区，如重庆的沙坪坝、北碚夏坝，成都的华西坝等地。这些都为整个川渝地区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3. 推动经济的大开发。内迁高校师生因地

制宜，在充分考虑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后，将自身所掌握的先进科学知识应用于实践，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抗战期间，金陵大学农科研究所育成小麦新品种“金大 2905”，在川西南和川北推广万亩以上，增产约 20%^[11]；园艺系研究部通过试验总结出番茄在川的栽培方法并推广种植，从此川渝地区才开始种植和生产番茄。而从山西迁往四川的铭贤学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学校对金堂柳叶烟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对其进行改良后，铭贤叶烟的知名度大大提高。各农牧实验场还对畜牧指导、稻虫防治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并进行推广。学校建立的机械实习工厂不仅能生产具有一定精密度的车床和织布机，还与政府航空委员会订立合同，制造出当时成都市场上难以购得的风筒天平^[12]；酿造实习工厂制造出的“铭贤酱油”，纺织实习工厂进行了金堂地方和民间纺织、印染技术的改良，为当地的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4. 扩大政治的民主意识。川渝偏远地区的人民因远离政治中心而缺乏应有的政治热情，对国家大事往往不太关心。高校内迁后将其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也辐射到川渝地区，激励当地人民追求民主与自由。当民主意识得到提高后，人民深受鼓舞，积极随同高校师生一起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川渝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由于当时环境复杂，高校里大家的政治信仰不同。无论是高校里还是社会各界中都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污蔑中国共产党。但内迁高校里已建立不少党支部，在川渝地区团结进步人士和当地人民宣传抗日，为日后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贡献。复旦大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团结广大民主教授和进步同学，为坚持抗战、争取进步积蓄革命力量，扎扎实实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武汉大学刚到乐山时只有三名党员。不久，队伍迅速扩大，开展系列活动，尤其是武大中共地下党组织发起的“抗战问题研究社”成为武大乃至乐山抗日救亡活动中影响最大的组织。^[13]

5. 改善医疗卫生的条件。中央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等院校不仅重视培养战时医学人才和附属医院建设，还纷纷为附近群众进行门诊、提供住院和上门医疗服务

等，为群众减轻了不少病痛，并向他们普及不少卫生知识。当时川南流行一种难治的“痹病”，患病初期周身乏力，皮肤发麻或局部肌肉麻痹，严重后会出现腹痛、四肢麻痹等，症状延至胸部即会死亡，所以又被称为软病或麻脚瘟。同济大学杜公振教授和邓瑞麟助教通过动物实验反复研究，查明病源是因为五通桥所产食盐中含有毒的氯化钡，研究出的治疗和预防方案挽救了成千上万的患者。^[14]

结 语

高校内迁是在日寇入侵肆意破坏教育机关

情境下的被迫选择，但这又蕴含着主动的应对，不仅保存和发展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命脉，还在大后方有力地支持抗战，并在迁驻地积极开展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人才。从迁入川渝地区后高校的发展来看，高校入迁后在困境中仍然履行了三大社会职能，将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直接服务社会相结合，确实促进了川渝地区经济、政治和科教文卫事业的现代化。这显示了高校的三大职能并不一定要分开执行，为现今大学的发展定位提供了借鉴。同时，高校内迁带来的新事物能和迁驻地很好地结合，获得了双赢，这也为我国已开展了近 12 年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 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28.
- [2] [12] 侯德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 [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1: 46, 101.
- [3] [4]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8: 372, 374.
- [5] 教育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54.
- [6] [8] 侯德础, 张勤. 高校内迁与战时西南科技文化事业 [J]. 抗日战争研究, 1998 (2): 105, 112.
- [7] 翁智远主编. 同济大学史. 第一卷 (1907~1949) [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7: 85, 87.
- [9] [11] 丁润生. 抗日时期内迁院校与西部开发 [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2 (4): 2.
- [10] 熊贤君. 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西部开发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3 (1): 67.
-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 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 [M]. 贵州: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8: 230.
- [14] 黄茂, 曾瑞炎. 论抗战时期医学高校的迁川 [J]. 抗日战争研究, 2005 (1): 47.

云南人民出版社新书推介



苏国有 著

定价: 38.00 元

《昆明密码》

本书是一部以地名为线索，对滇池区域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进行探讨，并对滇池的涨落、滇池区域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等问题提出管见的著作。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从历代地名、自然地名、文化地名等角度系统论述了滇池区域地名从古至今的发展状况，对历史地理学、地方历史的研究，对新昆明建设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